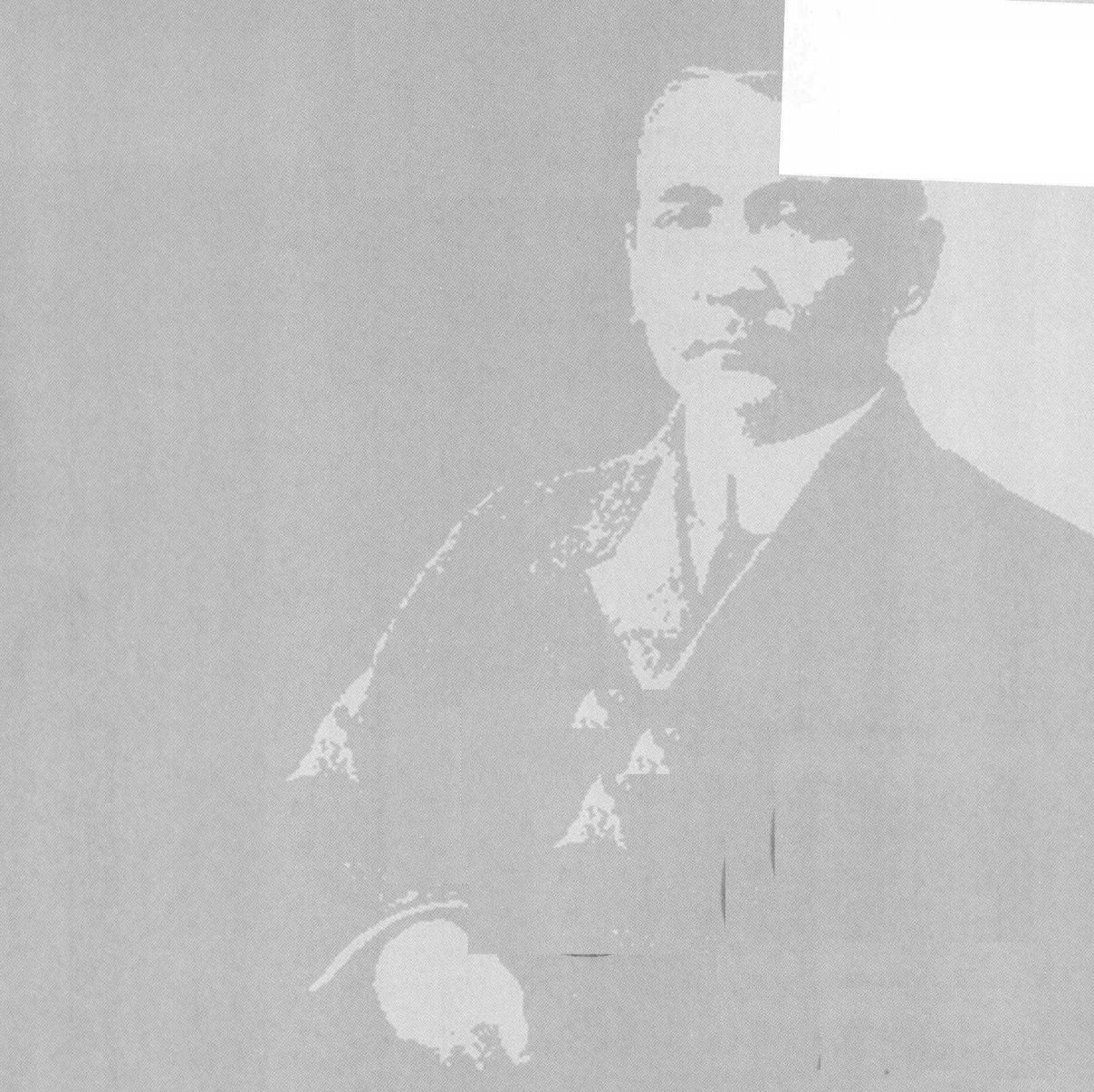


孙文学说

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身

张莘 张磊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孙文学说

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身

张 苹 张 磊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文学说: 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 张莘, 张磊
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203-08907-0

I. ①孙…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政治思想—研究IV. ①D 693.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7774 号



孙文学说: 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

著 者: 张莘, 张磊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柏学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907-0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自序

PREFACE

《孙文学说：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一书，是我们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的菲薄奉献。几年来，我们竭力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四部著作。本书则聚焦于孙文学说的研究，恰恰回应了 1981 年出版的我的首部著述《孙中山思想研究》。我们先前的几部孙中山传记和相关论文集，也大多侧重于思想研究。从那时到现在，30 年过去了，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

我对孙中山的研究，始自 50 余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孙中山思想研究》。后来的许多成果，也与这个课题大体有关。前后持续几近一个甲子，终于完成了《孙文学说：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本书虽然浅陋，却也显示了作者对人物思想、社会思潮研究的强烈关注和十分执著，这并非是偶然的，因为重大的历史变革总是要以思想为先导和指引。只要是人们从事自觉的活动，必然是由思想所驱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历史证明，确是至理名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了“批评的武器”的巨大作用：揭示旧制度的溃疡，开出疗救的方案。当然，“武器的批评”往往是必要的、不可代替的。反动统治阶级以暴力抱残守缺，则需要为先进理论所掌握的群众——社会物质的力量去摧毁。所以，深入、广泛和实事求是地研究人物思想、社会思潮，对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了解人们的头脑和思维活动，无疑是把握人们活动的关键。

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正如相识 50 余年、谊兼师友的金冲及同志在评论拙作《孙中山传》时所指出：“人的行动总是受其思想的支配。不了解他是怎么

想的,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对‘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自然更需要了解他对时代的认识,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种种设想,它给后人留下了哪些遗产。这样,才能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12月30日)

当然,就孙中山研究这项兼具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而言,我们仍须锲而不舍,不断加以深化和拓展。时代有此需要,研究有待持续。

没有理由自满和停滞,只能奋然前行。

—

文化,是一个具有最为广泛的内涵和外延的词语。它涵盖了烙印上人类活动痕迹的一切事物,从粗陋的石器到抽象的哲理。

社会思潮,无疑是文化的精髓部分。它关乎社会发展的取向、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诸方面,特别是在剧变的时代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入于近代历史阶段。但它未能走上正常的、健康的近代化路途,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期间充满着矛盾和巨变,正如梁启超所言:“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思想领域中异彩纷呈,古今中外的文化因素交汇冲突,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近代岭南文化亦复如此,它融聚了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和海洋文化,确是优长独具,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丛美丽的奇葩。面临“天崩地解”的巨大变局,加以西学的渗入,于是,作为中国近代时期的发端区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爱国、民主、科学、变革、开放等元素构成了粤东社会思潮的主旋律,映照出人文荟萃、群星辉耀的景观,孙中山则是最突出的代表,而且,他的意义扩展到全国和世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物是历史的链条”,精英人物推动了先进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成为鲜明的标志或符号。他们开始摆脱因袭的重担,摒弃愚昧和盲从,上下求索以探求救国拯民的真理,演出了多幕的悲壮史剧。所以如此,则是梁启超给予了中肯的诠释。他在《清代学术概论》

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敢于“冲决君主之网罗”的谭嗣同烈士等，赞颂他们振聋发聩的激越呼声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所造成的思想界的沉寂，同时，深切剖析和阐明了近代新思潮的主要动因：“彼辈当时并卢梭之《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一语中的，思想解放四字亦首见于文字。

二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林则徐成为“睁眼看世界”并且认真反思的首批人物，他和他的同道魏源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者的《海国图志》一书勾勒了世界的面貌，甚至肯定性地介绍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堪称变革先驱者的空谷足音，产生了颇大的影响，甚至波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所反映的思想、纲领和政策，包涵反对封建暴政及现存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但充溢其中的农业社会主义却有悖于历史的趋向，《天朝田亩制度》为其代表。只有洪仁玕在天国后期发布的《资政新篇》，显示出前瞻性的一抹亮色。作为纲领和方案，两份官方文献均未能够实现，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前者滞后而后者超前，缺乏现实价值和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

当然，维新思潮方可不愧为近代首次重要的思想启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爱国走向变革，并且引进了新学，主张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革新，实行温和的资本主义化。1898年的戊戌变法尝试为其付诸实践的顶点，但被清朝统治集团中握有实权的顽固派所镇压。

民主革命思潮不愧为第二次重大的思想启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倡导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组建了革命政党，领导了以“强迫”手段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孙中山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祖国的大地，继承和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西方引进和融汇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等，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和纲领，不仅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还是促使中国真正趋于近代的思

想先导。毫无疑问,孙文学说在当时具有史无前例的开拓地位和作用。

至于洋务运动乃至新政的观念和主张,尽管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陋规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度和广度,“自强”、“求富”泰半成为空言。实际上,倡导者主要是维护了现有社会制度,因之,不在思想启蒙和真正变革之列。愈益被唾弃的顽固派思想,则是对历史大潮的反动。

随着封建“末世”、“衰世”的结束,中国——尤其是岭南儒学传统的变易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经世派的崛起,他们怀疑以至批判繁琐的汉学和空疏的宋学,救亡图存和社会演进成为这个群体崇尚的学术诉求和实际功能。朱次琦、陈澧发其端,成为儒学从古代转向近代的中介。康有为则将儒学的变革推向更高阶段,借用了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甚至唤起孔子的亡灵,给他披上“改制”的衣衫。同时,他还逐步涉猎了西学。近代儒学对当世的社会思潮的附会和影响,显然未成气候。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近代史的后篇章。伴生的新文化运动当为第三次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在其发轫阶段,主要仍是对民主主义的补课,深化与拓展了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战线的“未竟之业”。同时,促进了革命精神的昂扬与探求真理的热潮。民主与科学是为两面旗帜,《新青年》杂志则是主要阵地。在后阶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成为主流。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是到来。

同全国相呼应,孙中山故乡成为思潮激荡的中心之一。各种理念和派别踊跃登场,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与形形色色的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些派别)进行争论——从改良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到新村主义,从国家主义到联省自治主张,各种社会思潮纷呈交织,但只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显示出生命力,后者,愈益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

处于疾风骤雨般历史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潮,共同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因为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乃是时代的必然;痛感

于民族危机深重,爱国主义成为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反对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则为另一主要课题;改变积贫积弱状况与争取繁荣富强,自然成为共识。

三

至于孙中山思想体系——孙文学说的研究,确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它在时间上定格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植根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社会,面临亟待解决的课题是独立、民主和富强,还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孙中山不懈地上下求索,从人类文化——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宝库中考察、辨识和抉择优秀的成果,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精神和中国的实际,熔铸革命与建设的理论、纲领和方案。此外,研究过程之所以步履维艰,不仅由于孙文学说内涵十分丰富,还因为客观研究环境往往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以至《孙中山思想研究》——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从成稿到付梓,竟然经历了二十余年(1958—1981)。但我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婉拒了同窗和挚友们反复劝告另选诸如太平天国史课题的建议,决意把孙中山思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乃是因为孙文学说无愧为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我当然明白这个课题具有的难度及其敏感性质,但我非常尊敬这位民主革命与近代化前驱,确认他的学说具有跨越悠久广阔的时空的性质。他的光辉的一生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迄今仍然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我决心知难而进,不惜惨淡经营,果然研究过程多次中断,“文革”中更受到“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树碑立传”的批判。我却相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兼纳其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因素,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必然会获致科学的成果。我的年轻的合作者持有与我相同的信念,虽然她的处境较我当年优越得多。

在《孙中山思想研究》的“后记”中,我曾就写作准则——理论和方法论作了几点扼要阐述。后来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大体无甚变化。首先,力求把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和近代化前驱的思想体系,严格地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范畴——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和当时

的世界形势之内,进行分析和评价。原因有三:第一,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考察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才能如实地作出科学论断,既不苛求其所不可能达到的,也不溢美其可能达到的。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才能体现。第二,只有把人物纳入历史范畴,才能确切了解他的思想赖以产生的现实土壤,从而如实把握这种思想的实质和内涵。外铄的作用当然不能忽视,特别是在世界日益成为统一整体的近代时期。归根结底,思想总是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论它的表现多么抽象和隐晦,否则只能成为没有依据的、缺乏生命力的虚幻之花。第三,只有把人物同他赖以活动的时代和环境密切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展示出他的思想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同时,便于同当代有关思潮进行比较。历史人物不是孤立的现象,他的思想绝不可能离开过去和当前思想流派的影响。从这种观念出发,我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理论表现和维新派的思潮作了比较分析,说明前者对后者的扬弃,并指出孙中山更多是从西方吸取了大量思想素材——主要是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一些相关元素。同时,还将孙中山的思想和当时各种思潮(包括革命民主派内部不尽相同的理念)作了比较,显示出三民主义的优长,反映了它的特色。事实表明,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堪称比较先进、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纲领和方案,至今仍有堪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其次,力求全面地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孙文学说的核心——三民主义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涵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和彼此补充的。对于民族主义说来,民族的本质、大亚洲主义等课题是不容忽略的。就民生主义而言,生产要素论、剩余价值论和外资等课题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至于孙中山以很大篇幅构建共和政体的设想,则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政体固然在最大程度上从属于国体,但国体缺乏相应的政体也难以实现它的基本性质。因之,不可把孙中山认真阐发的“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视为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和积极作用的泛论。不争的事实是撇开有关政体的设计,会使共和国方案的具体内容化为乌有。甚至对被孙中山自称为“味同嚼蜡”的《民权初步》一书也不能漠然置之,因为这部

给人以过于繁琐印象的会议通则,实际含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倾向,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性质。集会议政是实施民主的手段之一,而在从“君主制”直到“假共和”的长期过程中,被实施“偶语弃市”暴政剥夺了民主权利的民众显然并不熟悉这种民主形式。当然,孙中山思想的其他方面也决不可忽视。

再次,我力求把孙中山的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加以研究。在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先是从爱国和变革走上民主革命的路途;待到晚年,又把三民主义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地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是十分明显的,但又难以截然划分阶段。他的思想还在1894年兴中会建立前已经包含了“勿敬朝廷”、“造反”的革命因素。长达10年左右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时段,也绝非他的思想的中绝期;他的后期思想飞跃的大体完成当在20年代初期,却也可以上溯到1918年前后。因之,把《兴中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为孙中山思想的两次重大转折——从爱国、变革走向民主革命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主要标志,应当大致符合孙中山思想的演进历程。

还需指出的是:我在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活动的前夕出版了《孙中山论》,这是我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主要论文结集,完成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反观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虽历经曲折、顿挫、反思和重温马克思主义,始终不变初衷。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讲学,许多外国同行们对唯物史观是持误解和否定态度的,经过几多交流与争论后,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信仰。因此,我又在“后记”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研究孙中山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终极目的是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历史科学决非史实的堆砌排比,因之必须有赖于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宣称摒弃一切理论、方法论的“客观主义者”,实际上难免沦为形形色色并不高明的哲学的俘虏。当然,对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执著决不意味着采取故步自封的教条主义、主观随意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本身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会践踏真理和损害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浮躁的、极端功利、肆意炒作和非常偏颇的学风和文风,更是需要摒除。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优势首先在于有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

光阴荏苒,我已年逾八旬。回顾从事历史研究以来,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历程,确是起伏跌宕,发人深思。大致说来,以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为发端,到1961年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可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研究高潮。我也恰在此时开始了孙中山研究,稍后和“十年内乱”期间,孙中山研究基本停顿。研究者甚至受到惩罚,对我的批判大都发生在这些年份。我虽反复引用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和列宁关于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论述以自辩,却是无济于事。“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春天。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孙中山研究走向高潮,研究机构和学会相继成立,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在内陆、台、港、澳和国外频繁召开,不同形式的成果纷纷问世,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年轻的专业成员增多)。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同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成为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如研究难度大、起点高和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忽视,孙中山研究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时刻呈现了一些委顿的现象,令人颇为忧虑,却也催人奋起。好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使孙中山研究再创乃至增创辉煌。令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悦是:我与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革副研究员合著的《孙中山传》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定为向全国党员干部第五批推荐的学习书目,而另一本《孙中山图传》则被选入“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改造工程”的“装备”用书。这令我们欣慰而愧怍:兴奋的是孙中山研究为社会所需要和认同,歉疚的是著述质量有待提高。结论当是我们熟悉的孙中山的语重心长的遗言——“同志仍须努力”。

爰作几点说明,聊充自序,以便大家多些理解作品与作者,并兼恳请不吝赐教。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

第一章 孙文学说的文化导向与三个来源

- 第一节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反对“极端的崇拜外国”和“一味的盲从附和” 031
- 第二节 “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消除历千年而不解的“专制之毒” 042
- 第三节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055

第二章 中国正规民主革命与近代化的理论、纲领和方案

- 第一节 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是近代化的前提 059
- 第二节 “实业化”是近代化的重要内涵 061
- 第三节 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 063
- 第四节 科学、教育、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065
- 第五节 变革、“开放主义”是近代化的主旋律 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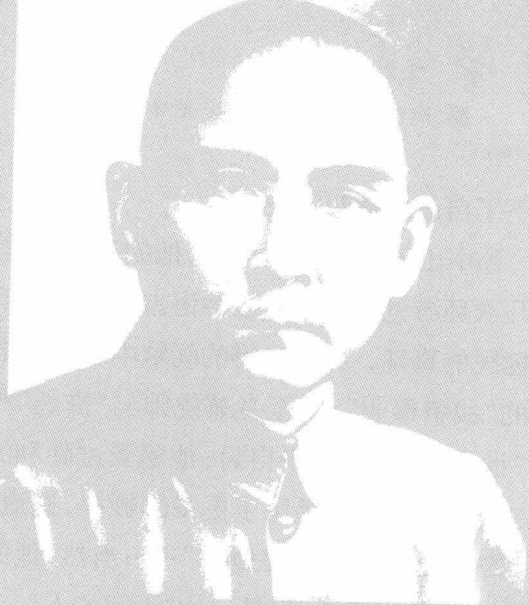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民族主义思想

-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 075
-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新阶段 088
-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 096

第四章 民权主义思想

-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 112
- 第二节 民权主义的新阶段 120

第三节 平等观与自由观	126
第四节 关于政体的构想	135
第五章 民生主义思想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	167
第二节 民生主义的新阶段	180
第三节 民生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	187
第六章 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	
第一节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200
第二节 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	207
第三节 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213
第四节 三大政策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	219
第七章 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	
第一节 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	234
第二节 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	239
第三节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246
第四节 社会历史观点——“民生史观”	253
第八章 孙文学说的持久、普遍意义	
第一节 体现了众多国家与地区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	265
第二节 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与世界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270
第三节 把中国与世界人民争取正义与进步的事业融汇一体	273
附 录	
孙中山重要活动年表	277
作者主要相关著述目录	319
引用、参考书目举要	322
后 记	337



导 言

INTRODUCTION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

他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九州大地的峥嵘岁月，梁启超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正是“天崩地解”般的近代中国曲折剧变的历史进程，把他铸造成一代巨人。

任何杰出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眼界、观念和理想总是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立足和凭借于现实的舞台，是以堪称“时势造英雄”。但是，历史又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必能倡导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他们的作为所产生的重大能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英雄造时势”也是这个命题的又一侧面。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他以近4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政治生涯延伸了两个世纪，贯串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他的足迹遍布许多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 and 地区，接触了各种类型的人士。他力图使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

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的，内涵十分丰富。他几次环游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乃至身兼统帅与“排长”^①；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前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能“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的重要角色。他必须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思潮澎湃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中国，难免以悲剧告终。他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订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他又是建设事业的重要擘画者，为实现近代化殚精竭虑，提出了完整宏大的纲领和方案，因为他确认革命与建设相辅相成。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始终自我超越不已，奋力攀登不止，无论是声望、威信和年龄的增长都未能导致思想僵化和独断。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不愧为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发展。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为一个“弧形”加以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弭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的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发展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壮志未酬。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国家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

孙中山的故乡在濒临南海的广东香山县。

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岭南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村却不富饶：“负山濒临，地多砂磧，土质硗劣，不宜耕作。”^①仅有70余户村庄的大部分居民生计艰难，他出生时的家境也是非常困苦的。父亲曾在澳门当过鞋匠，后来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农家的辅助性劳动，年龄稍长便下田操作。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很少有鞋穿。困苦的生活在童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曾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苦力的儿子。我生于穷人家庭，我自己仍然是穷人”^②。在他看来，“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③幼年和少年的遭际使他“早知稼穡之艰难”，他自称后来倡导民生主义显然与“境遇之刺激”有关。^④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L.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1934.

③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④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香山，蕴含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与革命的传统。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刚刚覆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给少年孙中山以深刻的印象。他从返乡的太平天国战士的口中了解到天国英烈的壮举，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出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衷心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①。

困苦的生活并未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孙中山陶醉于自己的意趣：游泳、捉鱼、捕鸟、放风筝、踢毽子，到附近武馆看三合会员练武，和小伙伴们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同清军作战。直到10岁方才入塾读书。他认真学习，为了节省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不求甚解地背诵儒家发蒙读物和典籍颇为不满，曾向塾师要求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释义。随着观察和思考能力的逐渐提高，周围的封建陋习引起他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反对家人给姐姐缠足，并因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愚昧、苦难和窒闷的社会氛围，使这个喜欢思索的少年常常感到困惑和痛苦。

孙中山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新世界，甚至甘愿离乡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长系心头，并在辗转流亡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虽终未能一睹镇上牧师保有的世界地图，但外部信息不断传到素以侨乡见称的香山。他的长兄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远航到夏威夷（檀香山）去做劳工，并逐渐拥有了商店和牧场。他对太平洋中那个“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终于在13岁时跟随母亲登上了停泊在澳门的轮船，经历20余个昼夜的航程，抵达了碧波环抱的檀香山。澳门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远行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增加了新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而在夏威夷居住的5年中，他在美、英教会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开始

① 《孙中山全集》第4卷，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